



《资本论》研究丛书

主编 陈 征 李建平

Karl Marx



《资本论》永放光芒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下册

李建平 黄茂兴 黄 瑾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资本论》研究丛书

主编 陈 征 李建平

Karl Marx

Das Kapital

《资本论》永放光芒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下册

李建平 黄茂兴 黄 瑾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下 册

三、《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一个比较研究/王立胜 周绍东	685
《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颜鹏飞	703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利益集团还是研究阶级？/侯风云	709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李正图	721
从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王瑶	735
科学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点/钱津	748
深刻认识和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两重性和相容性/陈承明	75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赵学增	771
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我国改革性质目标逻辑/常荆莎	79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拜物教的表现及其启示/林贤明	810
新自由主义市场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李瑞德	81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研究/李军军	82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名良	838

四、《资本论》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核心的思考/康静萍	853
实现收入倍增与控制通货膨胀的供给侧结构性分析/何涛 吴垠	87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黄茂兴 叶琪	902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治理走向/黄宁莺	912
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陈凤娣	923
浅析城乡接合部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与特征/严思屏	934
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导向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 /谢伟杰 陈少晖	955
我国振兴实体经济的着力方向与路径选择/黄聪英	974
“一带一路”战略的哲学方法论启示/杨小霞	100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能过剩的《资本论》阐释/孔祥利 赵娜 ...	1013
建国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争论和演进/孙晓军	1027
《资本论》对促进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意义/祝健 彭向升	1041
我国反贫困模式的现实选择：政民融合互动探讨/鄢奋 陈昌健 ...	1052
附录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 研讨会”专题	1066
后记	1091

三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硬核：一个比较研究

王立胜 周绍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多次阐述，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论断。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认识 and 把握这一体系的“核心”，理论界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理解，这就需要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2017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首次披露了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认识：“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①

与“理论核心”相类似的是，西方科学哲学也提出了“理论硬核”这一概念。在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拉卡托斯看来，这个“理论硬核”是指某种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一个或一组形而上的假设，它规定了该理论体系及其内在要素是不能被经验证据所驳斥的。而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都首先要对人的经济本性进行规定。本文在借鉴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基础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的理论硬核进行比较，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上把握人的经济本性，进而将“能动的社会人”作为自身理论

*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周绍东：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硬核，而作为这个理论硬核的实践诉求，“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一部分简要阐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基本概念，阐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硬核所面临的各种诘难，分析“经济人”理论硬核遭受致命性危机的根源。第二部分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硬核（一般）和理论硬核（特殊），提炼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由此反推该体系的理论硬核，提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人”理论硬核。第三部分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是“能动的社会人”，并分析这一理论硬核超越西方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优势。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硬核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的实践要求。最后是结语。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

1.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先后发生了两次话语革命，第一次革命以 1962 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作为标志，库恩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科学观，不仅否定了逻辑经验主义，也批判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从而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热烈争论。但是，库恩主张科学的发展不受客观规则的支配，而取决于科学家的心理转换，这就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从而沦落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为此，拉卡托斯于 1978 年出版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尖锐地提出了以下问题：在一种新的理论取代旧有理论时，新理论有没有一种不依赖于科学家主观心理状况的优点，如果有，那这个优点又是什么？这就是拉卡托斯本人所强调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在拉卡托斯看来，如果一个理论系列的每个新理论“与其先行理论相比，有着超余的经验内容……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的事实”，那么，它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确认”，那么，

这个理论系列就是“经验上进步的”。如果一个研究纲领“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拉卡托斯就称之为“进步的”研究纲领，否则就称之为“退化的”研究纲领。^①

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些方法论原则构成的，其中一些原则告诉研究者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而另一些原则告诉研究者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明确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是禁止我们去质疑“硬核”的，这一“硬核”是不可反驳的。但与此同时，研究者又必须提出相应的“辅助假说”，从而在硬核周边形成“保护带”，这个保护带在对理论的检验中是可以调整的，甚至可以被全部替换以保卫理论硬核。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中“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由于经济学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因此，对于人的经济本性的判断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学的“理论硬核”。

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及其面临的危机。

经济学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皇冠，从方法论上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被视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学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科学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界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目前，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经济理性人”假设作为其理论硬核的（也有学者提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之上，还有所谓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②、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为更高层次的内容，但我们认为，这已经超越了研究范式范畴而进入世界观领域，而唯心主义世界观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特有的世界观基础，无法通过唯心主义世界观把经济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此，不宜将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看来，

^① 参见[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

^② 参见傅耀：《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硬核及其当代意蕴——从理性主义的纬度透视》，《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

人类的“自爱”甚至人类的“自我利益”，乃是社会进步“普遍的动力”，而这种“普遍的动力”又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行为。亚当·斯密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秩序的性质，把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而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至于这种利己心的根源，西方学者的观点是将其归结到基因层面，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言，“我将要提出的观点是：任何成功基因的突出特征都是无情的自私性。基因的自私性通常决定了个体行为的自私性”^①。

对理论硬核的界定，直接反映了该理论体系的实践主张。既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是自利的，那么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便直指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要成为科学，必然且必须是一种数学性质的科学，经济学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我们所厌恶的最小代价保证我们所希求的满足最大量，换言之，使快乐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课题”^②。

作为“科学研究纲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硬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诘难。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是对十七八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人格抽象，而通过杰文斯、门格尔、马歇尔、米塞斯、弗里德曼等西方学者的努力，经济人概念一跃成为彻底形式化的人性概括，成为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抽象范畴。在这一理论硬核周边，西方经济学还发展起一系列譬如“效用最大化”“完全理性”“私有制最优”等方法论原则，成为保卫理论硬核的保护带。但是，这一理论硬核所面临的最大诘难在于，不断地出现人类利他行为的“反常”现象，也就是说，人类利他行为与经济人假设所推导出的预期是相悖的。对于这种反常现象，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发展以下三个方面的“保护带”进行辩护。

第一种辩护企图拓展“效用”的外延。为了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大量

①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

② Jevens. Stanley,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Kelley and Millman. 1965, p. 35.

利他行为，西方经济学把所谓的“效用”范畴从物质利益拓展到心理感受和社会认同层面，形成了以下解释逻辑：经济人的利他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精神上的利己，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欲望，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利他。但是，这种逻辑混淆了利己与利他的客观行为界限，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窠臼。^①实际上，只有从客观角度对利己和利他进行观察才是具有分析意义的，通过主观感受把利他行为全部归结于心理上的利己，这种辩护显然是诡辩，因此也必然是苍白无力的。

第二种辩护企图改变“完全理性”这一保护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能力的精密“计算机”，会综合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进行最优化计算，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很多诸如次优方案、可接受利润等经济现象，对于这些“新奇事件”，西方经济学企图引入“有限理性”概念对经济人理论硬核进行修补。“有限理性”即是指经济主体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并不总是进行最优化的行为决策，也就表现出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外在特征。^②但是，“有限理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经济人假设所面临的困难，譬如，在家庭领域出现的大量利他行为证伪了经济人假设，但又不能为“有限理性”所解释，这是因为，家庭领域基于血亲的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而很显然，这些行为并非源自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想要斤斤计较，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父母对子女晚辈的哺育、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反哺，与经济人假设中描绘的图景相差太远了。

第三种辩护提出“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向度，企图从微观和宏观相统一的角度保护理论硬核。这种辩护源自于亚当·斯密的论断，“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一论断也造就了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叙事。而事实上，西方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经济局势和愈演愈烈的经济危

① 参见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机,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一神话。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雪拉·唐和杰弗里·霍奇逊等人在回答2008年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向在场学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时,就明确回答,“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也没有看到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支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①。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理论硬核所进行的辩护是失败的,保护带的引入并未能发挥对理论硬核的保护作用,反而引发了更多无法自圆其说的“新奇事件”。这些“新奇事件”都表明:原子般的、恒定不变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说,该理论硬核已经被事实证伪,也正因为其理论硬核不再成立,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

1. 理论硬核(一般)与理论硬核(特殊)。

19世纪中期以来,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分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两种理论体系,两者在研究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上都呈现出较大差异。西方经济学作为满足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经济学科,很自然地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不变的制度形式,因此,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人的经济本性也是恒定不变的。用科学研究纲领的话语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具有历史一贯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唯物史观方法论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是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

^① 转引自马涛、龚剑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济学，两者的理论硬核也是具有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判断具有历史一贯性，但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由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假设所决定的人的经济本性是不同的，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生产目的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之为理论硬核（一般），后者称之为理论硬核（特殊）。更明确地说，理论硬核（一般）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把握，而理论硬核（特殊）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判断，由于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人的经济本性是具有差异的，因此，这也决定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目的是具有差异的。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将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界定，在此基础上，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差异性。

2. 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人”理论硬核。

“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假设，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一般），在这里，社会性才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马克思提出，经济关系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这就表明，“经济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将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任何“经济人”的行为决策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②。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社会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人，这是指无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越其时代，他都无法真正意义上超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而只能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人同时也是“现实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

结合的理论硬核（一般）和理论硬核（特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硬核（特殊）的范畴，这也就涉及如何历史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说。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只不过是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格化表象而已。“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正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理论硬核所遭遇的危机，一方面在于“经济人”假设过于强调人的个体特征，缺乏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考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分析方法，不能历史地看待人的经济本性，这就把“人”固化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导致了对人的经济本性的严重误读。

3.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共中央开始组织编写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1940年年底，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未定稿，但由于受到战争等的影响，这项工作一度停顿下来。二战结束后，苏联重新启动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51年，苏共中央组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了针对这本未定稿的经济问题研讨会，斯大林针对大会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发表了书面意见。1952年，以斯大林书面意见为主要内容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并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著的重要依据。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分析研究，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这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①。基于这一生产目的，斯大林还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是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第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不是从高涨到危机，再从危机到高涨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持续性的发展。第三，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伴随着技术的周期性间歇状态，而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完善。^②

尽管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并没有直接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反向推论。从这一论断本身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能准确把握人的本质问题，在斯大林那里，人的需求是以“社会”形式表达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已经被淹没在“整个社会”之下了。也正是出于对社会性的强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原则，“各个生产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部门的发展必须遵循必要的比例”^③。而在这个整体中如何体现“人”的存在，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呢？那也只能是冷冰冰的物质利益了。在这一点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他指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9页。

② 参见顾海良主编《新编经济思想史》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50页。

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①也就是说，由于从根本上忽视人的本质属性问题，也就不可能形成对人的需求的准确把握，而这种需求只能是在人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寻找。“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②

总的来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尽管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理论硬核，但它片面强调社会生产的整体性，将人看作是生产机器中的零部件。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具有机械性的一面，只不过这种机械性更多的是以“原子般的个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正如博兰所言：“令人遗憾的是，当理性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颇为机械的关于决策行为的观点——也就是个人被视为一台机器”^③。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质疑并摈弃了经济人完全追求个人私利的核心假设，但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走向了另一个理论硬核的极端，这就是将人视为完全服从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机械社会人”（1988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正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甚至径直提出了“生产的人道化是时代的要求”等论断。尽管这本教材充斥了大量去意识形态化和所谓新思维的错误观点，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也反映出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人的经济本性^④）。这种僵化的人性解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苏联在社会生产中采用单一化的激励手段。长此以往，以物质利益为重心的激励机制难以为继，对精神激励、荣誉激励的轻视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发挥出来，整个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的理论硬核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第80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第431—432页。

③ [美] 劳伦斯·A.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④ 参见[苏]B. 麦德维杰夫、A. 阿巴尔金：《政治经济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向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硬核：能动的社会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层面把握人的经济本性，将人视为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这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械社会人”假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不是孤立存在的理论概念，而是与基本方法论、理论立场、实践诉求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纲领”。

马克思强调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应是“社会人”，但不否定和排斥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动机。他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不同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个人的私欲是历史的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刻画就深刻地表达了这一分析方法的精髓：“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靈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不否认个人利益和物质需求的存在及其意义，但同时又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人”范畴。针对人的经济本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人不同于物，却与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他人中去实现自我；人依赖于自然，却又在不断否定自然；人受制于必然，却又享受着自由；人的生命和流动是有限的，却又在追求着无限的未来。”^②这段话表达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人必须在利我和利他中寻找平衡，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属性，人的需求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将“经济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②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